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立足当代中国现实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阐释十九大文化建设理论

童恒萍

【摘要】中共十九大正式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理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作出了一定论述,阐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的实现必须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民族精神之根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对待中华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统一,力图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同时,应基于传统文化,立足于现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中华文化 文化自信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收稿日期】2017-11-27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8)01-0051-05

国家与民族的兴盛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国梦的实现既要依托于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又要依托于中华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十九大提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推进当代中华文化的兴盛,最根本的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文化建设实践,这是中华文化立足于当今现实、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总依据。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

十九大报告主张,思想文化建设必须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文化兴盛为支撑。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战略,并从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战略要求,其中就包括从民族复兴的大视野观照、规划当代中国文化的新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②习近平同志对于中华民族复兴与文化兴盛内在关联的深刻揭示,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民族走向重新振

兴,不仅需要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更需要有民族文化力量的牵引、推动和支撑。

道路决定命运,文化的兴盛同样成就于正确的道路。习近平同志在大量的论述中深情回顾了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之不易,阐明了中国人民走这条道路的历史必然和实践成就,同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2013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讲话中提出“四个讲清楚”:“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③“四个讲清楚”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就对待中华传统文化

①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人民日报》,2017-10-28。

② 中央宣传部等:《开启新征程的科学指南——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交流文集》,第172页,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

③ 杨光斌:《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中国文明基体论的延续》,第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的态度而言,可体现为历史根基、当代价值、国际视野、人类高度四个维度。^①“四个讲清楚”表明,现代性政治需根植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基因。

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②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需要既讲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文化渊源,又讲透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③深入解读十九大报告,我们发现其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渊源,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根据,同时呈现出这样一个道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之路、新生之路、复兴之路。

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决定一个国家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从价值观层面上说,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不能脱离其所属的历史传统而存在。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道德资源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因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⑤。总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应充分继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文化血脉和基因,敢于正视与选择传统核心价值观在古代社会的教化方式,善于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古为今用,从而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具有中国人独特气质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坚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提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⑥在当前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积极贯彻十九大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⑦文化自信背景下,我们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是一个被传统伦理道德充分浸润的国家,在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中华民族依然承继着传统的基因,而只有基于传统,改造传统,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才能使当今的文化道德体系构建找到根基。如中国古代的教化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强化对民众的思想控制,虽然它的一些方法方式有不可取处(如“神道设教”),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教化理论和方法中包含着合理的、有价值的因素。中国古人始终认为善源于教,进而认为良好的政治乃至国家的富强都与教化的成功与否有直接关系,这些思想是有价值的。中国古人在推行教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套成功经验,反映、体现了道德教育的一般规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⑧

十九大召开之前,习近平同志对文化建设作出过一系列精辟论述,不仅提出了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思想,也从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高度规划当代中国文化的新发展。习近平同志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文化观,立场坚定地表明了党对待自己民族历史文化所持的态度。他强调,应加大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

① 孙书文:《从“四个讲清楚”看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载《理论学习》2017年第2期。

②⑥⑦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人民日报》,2017-10-28。

③ 中央宣传部等:《开启新征程的科学指南——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交流文集》,第174页。

④⑤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载《党建》2014年第3期。

⑧ 杨威、刘宇:《明清家法族规中的优秀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第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

史正面宣传的力度,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突出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化软实力地位,有益于“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①“骨气”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柱,体现出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底气”则能使中华民族自信自觉、从容不迫。习近平同志的“骨气”与“底气”论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文化日益成为各国综合实力竞争的新场域,提升文化软实力越发成为中国重要的战略选择。自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越来越重视世界文化格局与文化竞争,明确作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摆在第一位加以强调,同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独特魅力,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心,还需要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力度,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国民素质,从而使中国 13 亿国民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有效主体。^②如构建当代社会良好家风,必须立足当今社会现实,打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血脉联接。传统家风所倡导的尚中贵和、明礼廉耻、孝慈仁爱等伦理观念几千年来已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构建当代家风必须将传统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结合,通过创造性转化,为传统伦理赋予新时代内涵高度提炼传统家风的精神内核,使其创新性地发展为当代社会可普遍遵循的价值理念与道德规范。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应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当今现实,力图实现对日常人伦价值观的超越,促使当代社会价值观发生时代转化与升华。因此,在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层面,应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切入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将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加以创新发展后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构建符合当今社会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如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体现在政治治理方面是“致治”。中国有着丰富的“致治”思想,“致治”即国家得到治理,实现政治上的安定清平。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正是从中国文明基体论出发,以改革为方法,以公正价值为导向,使制度体系与治理能力相适

应,从而使以民主集中制为内核的中国政治模式更具活力和生命力。^③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对于中华民族作为文明古国、文化大国高度的自觉自信作了丰富的论述。十九大报告中也有重点阐述:“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④真正的文化自信,既表现在礼敬自豪地对待自己的优秀传统、客观理性地认识自己的当下发展,又表现在敢于美人之美、成人之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对内应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中国当今现实;对外应辨别良莠、择善而从。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深刻认识其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所具有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中华传统美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涵盖了如孝顺父母、和睦邻里、与人为善、勤劳简朴、尊师重道、正直廉洁、扶危济困等内容。这些都是当今社会应加以继承与弘扬的美德,应在构建当今社会道德文化时加以借鉴。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中的人伦次序和等级观念,本质上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对于传统文化的这些消极因素则应加以甄别和摒弃。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要以科学的态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不能固守传统,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不可抛弃中华文化根源,不然我们民族的精神命脉难以继承。对待中华文化,应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所鉴别、有所扬弃地予以对待和继承,既不能片面地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厚今薄古。国家治理现代化正是立足于中华文化传承而实现的适应性与包容性的统一。这样的政治治理机制才能使国家治理体系更具活力和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是在古代特殊的历史

①② 中央宣传部等:《开启新征程的科学指南—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交流会文集》,第 173、176—177 页,学习出版社 2014 年版。

③ 杨光斌:《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中国文明基体论的延续》,第 34 页。

④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人民日报》,2017-10-28。

文化背景中孕育而生的,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不同朝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化加以汲取和融合。儒家的“和”是维护等级制不平等基础上的“和谐”,是以“礼”为基础和准则的。我们当代对于“和”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应以是否符合当代中国现实、是否符合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等为衡量标准,对于传统“和”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利用好“和”文化对于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稳定、协调作用,以历史与现实统一的视角观照“和”文化。“和谐”既是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契合与统一,也是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根本要求。“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文化的价值目标之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伦理文化的重要理论依据。“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是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传承。”^①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离不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明及传统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可谓金石相杂、瑕瑜互见。当今文化建设历程中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充分发掘、系统整理与价值评判。但总体来说,中华传统文明与文化是瑕不掩瑜的,有必要对其进行现代价值转化。然而,现代转化并非终极目标,我们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统一,对中华传统文明去芜存菁、去伪存真,使其最终融入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之中。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包含国家的大一统、民本、和为贵、文化的包容与中庸之道、家庭伦理本位等,这些基因代代相传,已融入华夏民族的血液之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立足中国自己的条件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些政治智慧正是基于对中华历史的洞见,充满了对于中华文化和中国前途的自信。中国所选择的制度及目前所从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是中华文明基体的一部分,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中国在适应性与包容性的统一中充满了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充分表述了对中国文化与制度的自信:“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如既往地肯定了中华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主张要用中

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传统这一宝贵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自信心的重要来源,即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创造;自信心的重要内容即我们有能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从而以坚定的步伐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三、以历史与现实统一的视角观照 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进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一方面,传统文化体现了历史文化的衍生与流变,早已深深地烙入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成为“活”的文化生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承载着过往历史发展而成的道德标准与价值系统,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与延续,是民族精神鲜活的生命载体。在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立根之基。在中华传统文化现代转化过程中,我们要以古为今用、继承创新的态度从内容层面进行革新与突破;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式从精神层面加以传承与弘扬。只有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得以创造性转化,它才能以新的面貌和内涵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实现其当代价值。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构建当代社会价值观要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个人成长的价值观念合为一体,实现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认同并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实践。如当代中国家风构建这一实践领域中,当代家风继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可视为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内以儒家思想为依托的家庭道德衍生史,同时其扎根于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将家学文化与道德教育紧密相连。传统家学文化强调的家庭伦理秩序,要求家庭成员在日常交往过程中按照一定的伦理关系及其相应的伦理准则来行事,如强调“百善孝为先”这样的传统家风,千百年来备受推崇。传统家学视“孝”为立德之本与行为准则之首,将“仁”视为处理人伦关系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力图实现“仁”与“礼”在“孝治”中的统一。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传统伦

① 杨光斌:《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中国文明基体论的延续》,第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理道德自身也在不断地自我更新与时俱进。构建现代家风应对传统家学文化伦理精神的内核进行高度凝练,将前人的家学典范树为后人道德理性的标杆,进而促使人们形成符合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庭道德观念。我们在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应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探索和检视,在宏观层面实现传统道德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对接;在微观方面实现社会成员对社会价值观体系的认同,最终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使其与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相一致。

当今社会是一个开放、动态的社会,兼收并蓄各时期各学派的思想成果,必然能够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加快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如研究墨子兼爱、节用、节葬、非乐、非攻及荀子“节用以礼”“所渐”等思想,尤其是比较研究荀子与墨子的环境伦理观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立足于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用现代生态文明理念观照中华传统环境伦理文化,使我们得以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资源,探求其中的生态文化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启示意义。墨家节用、非攻思想包蕴着积极的可持续发展、维护现有生命多样性的生态保护思想。墨子以兼爱、非攻、节用为核心的环境伦理观,对现代建立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社会有重要借鉴意义。“西方近代生态理论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生态危机所造成的震慑和恐惧,而儒家的天人之学,主要不是受到自然惩罚的结果,而是建立在本然的情感与深刻的体认之上。”^①现今,我们要扭转人类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心态,必须在生态哲学的基础上建立环境伦理。而“儒家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理解环境伦理学,是一个不同于西方的重要的方法。由此出发,可以找到改变西方环境伦理基础的东西”。^②从人类的认识和感情上同时解决问题,从而从根本上改造人们的环境伦理意识,使之更适应现代生态文明的需要。

关注荀子和墨子环境伦理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为现代社会发展找到可行借鉴。墨子倡导文明的消费观,针对当时奢靡的经济现状,墨子发出了“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呼唤,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其目的在于引导人们正确合理地利用资源,通过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最终实现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不但要遵从大自然的发展规律,还要与自然为友,和谐相处,选择有益于身心健康发

展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恰当地处理物我关系,促进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荀子与墨子的环境伦理观对于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改善目前的生态环境,提供了一笔丰厚的资源。荀子主张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应“制天命而用之”,清楚地认识到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必须合理有节,不能将自然界完全视为单纯的客体使用对象。儒家对待自然的态度,不只是为了人类自身。这种不只是以“我一它”而更是以“我一你”来看待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态度,正是儒家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③荀子的“天行有常”生态哲学观、“制天命而用之”生态利用观及圣人之制的生态保护观,对于我们自觉维护生态平衡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儒家的天人观是整体的大生命观,其主张人类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认为人类的伟大与尊贵不表现在对自然的征服上,而恰恰在于人类能够自觉为大自然考虑,善于“事天”,从而起到“天地之心”的作用。现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构建正是要以天人和谐相适为社会发展第一位,同时要树立人与人的和谐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一致的社会发展观。中国传统的环境伦理思想,理应成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和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所需挖掘的思想资源的重点之一。

总之,十九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进一步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性。当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与现代转换,既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应当迈出的坚实一步。

(作者简介:童恒萍,江西泰和人,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建平;责任校对:于尚艳】

- ① 王军:《荀子思想研究》,第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 ② 余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第171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③ 彭国翔:《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第47—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